

包容性强·本色厚重·源远流长

——湘东文化特点论说

骆晓会

(湖南工业大学 期刊社,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湘东文化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异质包容性强,这也是一种移民文化的特色,在湘东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许多外来文化因素在这块共同的地域内流传,并被相互包容,共同拥有和对比参照;二是文化本色厚重,在这里,儒家书院续千年学府,宗教寺庙现星罗棋布,茶陵诗派成一代风流;三是传承源远流长,基本上与中华文明共生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炎帝或神农文化。

[关键词]湘东文化;湘东方言;移民文化;书院;茶陵诗派;炎帝文化;株洲

[中图分类号]G.127(264);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2)03-0108-05

Inclusiveness and Massiness with a Long History

——An Analysis of Cultural Features in Eastern Hunan

LUO Xiaohui

(Periodical Pres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Eastern Hunan culture embraces three distinctive features. The first is its strong inclusiveness toward heterogeneous cultures, which is also treated as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migrant culture. In Eastern Hunan, many external cultures are widely spread, mutually penetrated and contrasted. The second is its massiness. In this region, it is dotted with temples. Moreover, it is famous for a Confucian Academy and a branch of poems in Chaling County. The third is its long history. It is basically as long as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which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is Yan Emperor Culture.

Key words: the Eastern Hunan culture; the Eastern Hunan dialect; the migrant culture; academies; a branch of poems in Chaling County; Yan Emperor Culture; Zhuzhou

地域性和民族性是文化的两个重要属性。中国地域宽阔,民族众多,历史上各地区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加上民族融合杂居的情况错综复杂,沿海和内地,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及相邻省、市、县乃至乡镇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各地各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当然,有的地域的文化内涵的形成并不是固有的或土生土长的,而是外来的、引进的。但外来文化也有一个对当地自然和社会的适应或与原土著文化的融合过程,也就是在这种适应和融合中必然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特色。湘东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揭示和了解其特点,对我们深入研究湘东的历史文化,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地方文化传统与精神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经初步探讨,笔者认为湘东文化主要有异质包容性强、文化本色厚重、传承源远流长三大特点。

一 异质包容性强

“湘东”自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从古至今,在这个地域内人们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大体上逐渐自成体系,即形成了湘东文化。但它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

收稿日期: 2012-04-01

作者简介: 骆晓会(1954-),男,湖南零陵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世界现当代史和中俄关系史研究。

体系;也不是单要素的,而是多要素的。即对异质文化因素的吸收或包容性很强。“湘东文化”本来是一个地域文化概念,也正是由于其包容性强,导致其地域色彩被弱化,许多时候甚至被人们淡忘了。“湘东文化”其实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地域文化概念,首先从湘东方言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特性,因为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稍具方言知识就知道,我国南方的方言,多是在几千年的居民牵涉及相互影响中逐渐形成的,湘东方言正是如此,它主要来自江西移民的影响。

湘东方言是方言专家非常关注的语言文化现象,他们很早就将湘东,即“湖南东部濒临江西的狭长地带,包括从临湘、岳阳南至汝城的十五县”的方言,划为“类赣语区”,是湖南四个方言片区之一。之所以有这种结果,是因为“江西移民自唐宋五代始,及两宋元代已成浪潮,至明代而大盛”。^[1]到明清时期,又从江西、广东和福建迁入了大量的客家移民。^[2]之所以迁来大量的江西移民,这与湘东特殊的生态和地理环境有关。湘东与江西毗邻,中间似乎有罗霄山脉阻隔,但其实是断断续续,并不连贯。即使是群山密集地也间有不少东西向山谷平地,尤其是浏阳、醴陵、攸县及安仁、茶陵等与江西接壤的许多地方,还是江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灌溉条件好。所以,自古就是湘赣主要交通要道和外来移民定居地。根据《史记·食货记》,两省相邻的地区在两汉时期甚至不分彼此,同属于当时被称为南楚的豫章,而豫章则包括了今天江西的大部分地区。有意思的是,直到近现代这种现象仍在延续。如红色根据地时期,中共湖南省委1930年8月决定重建湘东特委,就将现在的株洲市管辖的四区五县及浏阳和江西的万载、宜春、荷香、莲花等地的党组织划归湘东特委领导,并同时成立湘东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今日江西萍乡市还有一个名叫“湘东区”的县(区)级行政区划,用百度搜“湘东”一词,往往就搜到江西这“湘东区”去了。

由于“当时的湘东本就地广人稀,移民又是批量聚居,他们的母语得以保存下来,湘东由北而南狭长地带的赣语区也就由此形成”。^[3]后来的客家方言与以往的湘东土语及早期的赣方言等杂处、融合,使湘东的方言更加混杂,导致有的居民不得不说两种乃至三种方言。^[4]即使操一种方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湘东方言中湘语、赣语及客家话等混杂的程度很高,甚至让方言专家有时也难辨其归属——到底将其视为赣语还是湘语抑或客家话?故将湘东各地不同的方言说成是“混合型方言”或与赣语和湘语并行的一种“独立型方言”。^[5]

当然不仅仅只有语言,还有许多外来文化因素在这块共同的地域内流传,并被相互包容,共同拥有和对比参照。包容性其实也是一种移民文化的特征。当然,这方面最早也是最典型的还是神农和神农文化,因为神农或炎帝也是外来的移民,具体我们放后面专门论述。明清以降一部湘东客家史,也是一部充满辛酸苦难的移民史。他们因各种天灾人祸而背井离乡,长途牵涉,但也能克服各种艰难险恶的环境,开荒拓土,随遇而安。这种移民具有的开拓精神,逐渐注入到湘东这块古老大地的文化传统中,被人们世代代无声无息地传承下来。到近现代,这种移民文化的风格和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性也丝毫不减。如不仅红色文化在这里扎营,与炎帝农耕文化完全异质的工业文化也在此蓬勃发展。例如株洲,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移民城市,又称“火车头拉来的城市”,所以近年政府和民间都赞成将所谓“株洲精神”表述为“火车头精神”。这种表述既有开拓创新的内涵,也有流动的意思,也就是都含有一种鲜明的移民文化的精神和气质。

在湘东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无论是上古还是当代,都有大量的移民流入。随着大量外来移民的到来,各种不同的饮食、娱乐、居住、出行等文化风俗习惯以及一般生活价值观也在这儿落地生根。例如客家饮食和过年习俗在湘东很普遍,像腊月二十三、二十四祭灶神、“立年架”,大年三十贴春联、留火种,大年初一“吃现饭”、“擦屁股”,正月初三“送穷鬼”,正月初五“接财神”等等,甚至连“过年”一词,据说也出自客家;炎陵现在还流行的酿豆腐、米粿、米酒(茶陵称胡子酒)、浸盎、潘蒲糕、豆拉子、米豆腐等等,客家色彩也非常浓厚。^[6-7]其中酿豆腐,是客家美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菜肴之一,还可用各种空心的及非空心的(挖空)蔬菜作皮,相应的又有酿辣椒、酿苦瓜、酿茄子等等(不过炎陵的酿豆腐皮远没有湘南宁远的酿豆腐做工精致考究,酿心各地口味不同难分高下,但宁远酿豆腐皮薄、心空、滚圆却相当有名)。

其实,到了现代,各地移民千百年来的杂居交融,许多习俗已很难分清到底是出自北方还是南方,是土著还是“客家”?不少习俗和价值观、审美观在相互不断的对比、参照和模仿中,或许早已改变了原来的本色或模样,成为新的价值标准或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楷模。如湘东有一句很流行的谚语说:“茶陵的城墙,攸县的婆娘,安仁的城隍”,^[8]这无疑是大家都认同攸县的媳妇,因为“攸县婆娘”的贤惠和能干,像湘东这个地域内众所周知的茶陵的城墙和安仁的城隍那样有名。

二 文化本色厚重

“文化”一词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广义的文化一般应包括精神文化、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而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也可以说是广义文化的核心或本色。精神文化包含文化教育、各种科学、人文、宗教、艺术等文化产品。被称作“文化”的事物,必然会有一定的历史积淀,所以“文化”通常是指历史文化。在历史上,书院文化和宗教文化无疑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湘东这块土地上,虽然历史上难说有全国数一数二的书院、寺庙,但可以说是书院林立,寺庙密布,其密度或数量在全国颇具盛名。我们说湘东文化的本色厚重,有道是:儒家书院续千年学府,宗教寺庙现星罗棋布,茶陵诗派成一代风流。

书院是儒学的实体,也是中国古代的民间教育机构。书院产生于唐初,宋明发展到极盛。它集教学、学术和藏书为一体,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方面,有关研究者概括得很好:“随着封建集权的加强,书院虽一度成为封建王朝的教化工具和封建官僚的培养机构,但书院相较于宋、明的官学教育而言,有着更为自由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气象,宋明理学在书院教育的推动下,在思想控制极其严格的封建社会中后期反而获得巨大的发展。这些发展得益于书院聚集了大量的儒学大师和典籍,建立了完善的教育体系,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和传统”;尤其是还“促进了地域性学术中心的形成”。^[9]

湘东各地历史上曾建有多少书院,具体数字现在一般已经很难作出准确的统计了,但其数量之多、密度之大,在全省乃至全国是名列前茅的,因为湖南书院的名气和数量都领全国之先。茶陵县的书院比较有名,且前些年曾组织开展过对茶陵书院史的系统调查和研究,故这里谨以茶陵为例。据统计:“茶陵历代兴建的书院,共达38所,其中29所续办至清末。就数量而言,茶陵书院之多,位居湖南各县(州)前列:宋代第三,元代第二,清代第一。”^[10]湘东在全国比较有名气的书院很多,如茶陵的洙江书院、东山书院、寻乐书院、明经书院(原名一经堂),醴陵的绿江书院,攸县的光石山书院,株洲县的龙潭书院(原名主一书院),炎陵的洙泉书院,浏阳的洞溪书院、围山书院,平江的天岳书院,安仁的宜溪书院、湘亭书院,等等。像光石山书院,经有的专家考证是现在所知的中国最早的书院,建于唐朝初年,而不是袁枚《随园随笔》里说的唐玄宗时期的丽正、集贤书院。^[11]被西方学者称为

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的《梦溪笔谈》,现存最早的版本——《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就出在东山书院,为创办人陈仁子所刻。遗憾的是,东山书院于明代和当代两次被毁而不见其痕迹。^[12]绿江书院则有历史上的两位大人物——朱熹和左宗棠曾在这里讲过学和长期执教。

由于书院的兴盛,所谓“惟楚有才”在湘东的表现也尤为突出。如从唐代到清末的科举考试,茶陵考取进士127名,状元、榜眼、会元各2名,其中不乏有以“四相文章冠两朝(明清)”著称的明清四大学士刘三吾、李东阳、张治、彭维新和民国政府主席谭延闿为代表的精英。^[10]安仁县的书院也不错,所以这一时期该县亦出了28名进士。^[13]

关于宗教的文化遗产功能、作用以及精神文化性质和内涵,文革过后,恢复文化理性后的普通中国民众,也已经有了一些常识性的认知,这里就不用多说了。湘东历史上曾有过多少世界三大宗教和中国道教的寺庙和教堂,现在也没有很全面的和确切的调查和统计,但我们从现在的比较精确的统计去对照历史上的模糊数据,也能给人多而密的印象。这里我们仅从湘东的主体部分,即株洲市来看。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株洲全市有正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536处,其中醴陵市和攸县占了约4/5,分别为200个和241个;按教别分类为:天主教3处,基督教79处,佛教171处,道教282处,伊斯兰教1处。另有正式登记民间信仰场所76处。共有正式宗教教职人员265人;信徒2.6万人,信教群众40余万人。^[14]而据民国版的《醴陵县志》记载,其历代建有佛道寺观334处,基督教和天主教堂39处,还有神祠273处,^[15]可见历史上肯定比当代更多更密。我们另以邻近的衡阳市(当然也有部分地域属湘东范畴)略作横向对比,因有南岳这样的中国宗教名胜的促进,其宗教场所数量在全国来说应该是不算少的,可是2008年全市也只有384处,^[16]远少于株洲市。

历史上湘东在全国影响较大的寺庙也不少,其中的佛教尤其是禅宗在全国的名气和地位不同一般。唐五代的时候,湘东禅风盛行,禅院林立,据统计有寺院达百余所,比较著名的有攸县的宝宁寺、大川寺,醴陵的云岩寺,茶陵的灵岩寺、皇霄寺,株洲县的空灵寺、资福寺,浏阳的石霜寺等。在这里荟萃了大批禅宗名师开坛讲法,为禅宗五派中的四派,即沩仰宗、曹洞宗、临济宗、云门宗(法眼宗除外)的形成、传衍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醴陵云岩寺和攸县宝宁寺就是曹洞宗的两个祖庭;攸县本土禅师,南岳石头希迁的得法弟子长髯旷是曹洞

宗直系师祖；过继给长髯旷的石室善道禅师对开创沕仰宗的领袖人物仰山慧寂有重要影响；而宋代以后，湘东禅师更是频繁奔波于江南，其影响“辐射全国”。^[17]还有像创建于唐天宝十年(751)，迄今保存完好的宝宁寺，在佛教界享有“北有少林，南有宝宁”之盛誉；尤其是其珍藏的大思想家王船山作序、1684年成书的《宝宁寺志》，更是文化之稀世瑰宝。

产生于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的茶陵诗派，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因该派领袖李东阳为茶陵人而得名。李东阳官至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有《怀麓堂集》100卷传世。当时社会弊病严重，而台阁体却粉饰太平让李东阳不能容忍，于是提出“轶宋窥唐”、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法度声调的掌握，洗涤台阁体单缓冗沓的风气，以振兴诗坛。李东阳在朝数十年，苦心经营，推贤荐才，旗下网络了众多门生，诸如邵宝、顾清、石瑄、罗玘、鲁铎、何孟春和彭民望、张泰等，在当时及以后的文坛都赫赫有名，从而终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宗或一派，也是当时的诗坛主流。茶陵诗派效法唐诗的主张和师古的创作倾向，亦成为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先声，给后世留下了积极影响。虽然一些研究者对其文学理论的价值有褒贬或不同看法，^[18]尤其是李东阳生活圈子平静狭小，其诗多为题赠之作和咏史之作，内容大体不出宫廷、馆阁的生活等韵题，也被广为诟病。但总的来说，一般对李东阳的文学理论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卓然成派，还是没有太多异议的。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将故乡“茶陵”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了中国文学史册上。

三 传承源远流长

文化必然带有一定的历史积淀。湘东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基本上与中华文明共生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炎帝文化。近几十年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也证明，上古长江流域文明是构成中华文明的两大流域文明之一，其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有不同特点，两大流域间频繁的文化接触、渗透和交融，最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上古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龙文化、茶文化等颇具特色和代表性，而炎帝文化几乎可以涵盖或包括这些特色文化。

许多研究已经证明，长江流域的农耕文化要早于黄河流域，其中水稻栽培的历史至少有1年以上。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的栽培稻，经碳14测年，大约在距今1.6~1.1万年之间。但是，栽培稻在历史上到底是谁、哪个民族发现发明自无可考，更无文字证明。所以后来

有文字记载后，其起源迄今仍是众说纷坛，所以人们只好把它归于一个虚幻的上古传说中的英雄或帝王——神农或炎帝。这是有文字记载后，许多正史和野史，对此作的补记。例如《汉书·律历志》记有：“以炎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而《周易经·系辞下》则云：“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风俗演义》说得更精确：“神农悉地力种谷疏”。

过去十多年来，全国与炎帝时代有关的一些地方的政府，推行“文化塔台，经济唱戏”的发展战略，促使许多文人学者掀起了一股研究炎帝文化之热潮，并根据以上记载将炎帝或神农说成是稻作文化的创始人。被同时加载在神农身上的创造和发明，自然远不只稻作农业，还有原始的药业、茶业、商业、制陶业、冶金业、纺织业、建筑业、天文历法等。^[19]这些表述的历史真实性自然有些让人生疑。其实稍微理性地辨析一下历史文献和几十年来考古学提供的大量资料就可以明白：所谓“神农”，其实不过是长江流域稻作文明的一种化身，而不是最初的创立者，它只有某种象征意义。因为炎帝时代，那怕是像有的学者说的，炎帝神农氏不只一个人，而是有多代神农，是所谓“一个家族若干代人的共同符号”，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神农时代距今的上限也只有5230~5220年，^[20]远离于考古学证实的稻作文明起源的年代。至于有的研究者认为“伏羲氏很可能就是烈山氏亦即第一代神农氏”，^[21]纯属主观臆测，并在论证逻辑程序上，中间有许多个空格和跳跃。神农氏、烈山氏和炎帝可能是三位一体，但与伏羲氏完全不是一回事，没有直接的文献依据，并且二者相隔1万年。虽然都是远古传说中的人物，但也不能扯得太离谱。所以，确切地说，炎帝或神农文化应该是稻作文化乃至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集大成者，炎帝时代已经是南方原始稻作农业和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繁荣期——这样表述和定位，可能更符合历史真实，而且也没有贬低炎帝和炎帝文化的地位，实际上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弘扬。这种表述和定位在湘东地域内直接的考古学背景或依据，是具有代表性的茶陵独岭坳文化遗址(距今7000~6500年，发现有栽培稻)和株洲县磨山早、晚期文化遗址(距今6500~4000)。^[22]

正如西方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炎帝文化的形成，就是人们将上古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明拟人化，并将其神话定型而逐渐转化为精神文明。事实上，这种转化从古至今一直未间断过，这也就是历史与文化的传

承。其本身的真实与否已经无足轻重,因为它已经成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和社会的某种精神寄托。这种传承最典型的是对炎帝的祭祀。据历史记载,官方和民间在炎帝陵的祭祀自古以来香火鼎盛、连绵不断。有记载的最早的官方祭典从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即已开始,盛大祭典在宋代“三岁一举”,明代不下15次,清代则有38次之多;而当代更不用说,据有关方面统计,炎帝陵自1986年修复以来共举办各种大型祭祀活动300多次,近几年每年举办大型公祭活动40次以上,每年清明、重阳的大型祭祖活动已成定例。^[23]炎帝文化,尤其是炎帝为发明药材和茶叶,不畏艰苦,历经磨难,勇于牺牲,遍尝百草的精神,更是千古流传,为后人敬仰和推崇,成为炎帝文化的精髓。为了纪念先哲圣贤,湘东许多地名及自然的和人工的景观、物产等,被古人和今人以炎帝或神农的名字命名,如“炎帝陵”、“神农谷”(炎陵县汪洋山)、“神农庙”(汝城)、“药王节”(安仁)、“神农井铁观音”(炎陵)、“炎陵县”及株洲市新建的号称拥有3000亩园林的“神农生态城”,等等。

总之,湘东文化绚丽多彩,内涵丰富,历史久远,特色鲜明。可是,虽然近十多年来株洲市政协文史委、株洲市志办、中共株洲市委党史办以及株洲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等官方和民间学术和非学术机构做了大量工作,有很不错的成绩,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对湘东文化的传播、普及和发掘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学术研究除了炎帝或神农文化之外,其他方面的研究还不深入和系统,许多领域的研究还是空白。这些都与缺乏更多和较高层次的文人学者的参与是有关系的。在此,我们特吁请身在湘东的本土或移民的和在外地工作的湘东籍作家、人文学者,根据自己的专业和特长,选择适当的角度,都来参与湘东文化的研究和普及工作,为地方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周振鹤,游汝杰.湖南省方言区划及其历史背景[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2):55-57.
- [2] 陈立中.株洲境内客家人源流考[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59-62.
- [3] 蒋军凤.湘东赣语的由来[J].湘东文化,2009(1):53.
- [4] 陈立中.湖南境内客家方言分布概况[C]//彭雪开,骆晓会,刘俊男,等.湘东历史文化研究.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257-275.
- [5] 李蓝.湖南方言分区述评及再分区[J].语言研究,1994(2):56-75.
- [6] 关怀.炎陵县客家人的过年习俗[J].湘东文化,2011(1):37-39.
- [7] 张观怀.炎陵县客家饮食[J].湘东文化,2011(3):54-55.
- [8] 李珂.从湖南茶陵方言看湘东的地域文化内蕴[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00-102.
- [9] 唐丽.中国古代书院与儒学教育[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1):152-154.
- [10] 苏铁军.茶陵古代书院的教育思想[J].湘东文化,2011(4):42-44.
- [11]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2-25.
- [12] 阳卫国.东山书院与《梦溪笔谈》[N].光明日报,2008-12-13.
- [13] 黄显文.安仁古代书院文化考[EB/OL]. [2008-04-09] <http://www.yx988.com/list.asp?id=30421>.
- [14] 株洲年鉴编辑委员会.株洲年鉴2009[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9:93.
- [15] 刘晓丽.近代醴陵城市文化初探[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63.
- [16] 衡阳年鉴编辑委员会.株洲年鉴2009[M].衡阳:衡阳年鉴编辑委员会,2009:150.
- [17] 谭特立.湘东禅宗的传播及其影响[J].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36-39.
- [18] 邓绍秋.明代李东阳茶陵诗派研究百年回顾[J].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3):60-63.
- [19] 陈胜利.炎帝文化与时代精神[J].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4):8-10.
- [20] 郑光.炎帝文化及其渊源问题[C]//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宝鸡: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2009:113-151.
- [21] 刘俊男.伏羲神农炎帝关系新论[C]//彭雪开,骆晓会,刘俊男,等.湘东历史文化研究.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9-17.
- [22] 席道合.漫谈株洲史前考古学文化[J].湘东文化,2009(1):33-35.
- [23] 百度百科.炎帝陵祭典[EB/OL]. [2012-03-24]. <http://baike.baidu.com/view/200467.htm>.

责任编辑:卫华